

## 從《做工的人》看：

### 藍領工人階級生產關係與社會關係的互動和變化

#### 壹、前言：

關鍵字：階級差異、生產關係、社會關係、階級流動、不平等

在林立青所著《做工的人》一書中，談到藍領工人階級與社會中上層階級的互動關係，時常都是帶有剝削、壓榨或是輕視的樣貌。藉此，筆者將著重書中邊緣人物的對話內容，以探討生產關係中，沒有生產工具的勞力工作者與具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其生產關係會如何決定和形塑工作場域內、外的社會關係，造成書中所呈現的情形？接著討論對於這些不具有生產工具又普遍在社會上受到階級汙名的工人們，在工作場域內、外（社會中）是如何互動。此外，筆者也好奇這些工人階級的子女在學校場域中的互動情形，因此，將以理論和經驗進一步分析，並提出我自己的看法。最後，以工人階級對於子女的教養態度，分析、釐清工人階級的子女是否有階級流動的情形，以窺探生產關係所建構出的社會不平等結構改變的可能性。在此我將以社會學的觀點，並放在台灣特殊的經濟發展脈絡下來探討，針對這些問題討論並撰寫研究論文。

首先，筆者引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描述和界定，分析書中的邊緣寫實經驗。在生產關係中因生產工具有無，造成勞方和資方的差異。又勞方因不具有生產工具，將其勞動力販售給資方，這裡便體現了馬克思所謂「商品化」意涵。藉此，再試圖描繪出這樣的生產關係是如何影響、決定了社會關係。隨後著眼於書中對於工人階級本身和社會（國家、警察等等）互動的書寫，立體化這些工人階級與社會關係的真實樣貌，以討論生產關係建構出的社會關係為何？另外，對於工人階級子女在學校中的互動經驗，將引用高

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offman,1959)和 Robert Grandfield 所著的《Making it by faking it-Working-Class Students in an Elite Environment》分析勞工階級的學生在學校與他人的互動關係，也提出對此相關的看法。

最後討論對於階級流動的可能性，此處並不針對工人階級本身代內流動的可能性進行探討，原因在於這些工人階級代內流動的可能性已經具有相當程度上的侷限性。在台灣的產業結構轉型<sup>1</sup>中，已經逐步導向高科技、高知識的技術密集型產業，而非像早期 70、80 年代因政府加工出口政策的推廣和誘因，有利於外資的引進和進行大量的出口。諸如此類結構性的因素使然，促使階級流動的相對機會開放，而能有效地在「代內」進行流動，有著許多「黑手變頭家」<sup>2</sup>的情況發生。但在目前著重於高科技、高知識的新經濟下，這些工人階級的勞工們往往未受太多的教育，且也無時間、精力和金錢再去額外修習高科技產業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識。綜合上述的因素，將這群工人階級的勞動工作者束縛在階級的「牢籠」中。在此筆者並不悲觀地認為這些工人階級的勞動工作者完全沒有階級流動的可能，但若以整體來觀察，其階級流動的可能性與其下一代相比仍是相對侷限的，也因此工人階級的勞工普遍會將期望和資源投注在下一代中。在此筆者將著重於書中對於工人階級的教養態度的描述，進一步分析工人階級對於教育資源的投入和期望的差異，推論出其子女是否能依靠著教育的方式，獲得翻轉階級的可能性。因教養態度的差別導致對於教育投資的落差，影響勞工階級子女透過教育的管道獲得階級翻轉的機會，此部分將引用地位取得理論進行討論，說明在家庭、教育及個人中間資源流動的情形。且以 Pierre Bourdieu (1984; Bourdieu & Passeron)

---

<sup>1</sup> 台灣是全球第 22 大經濟體 (2016 年數據)，早年特色為中小型企業眾多，今日的經濟結構已經由高科技產業取代原先的勞力密集工業，且農業在 GDP 中的比重從 1952 年的 35% 下降到 2%。至今形成服務業與高科技產業合計比例過半的形勢，但也面臨傳統產業快速外移 (特別是中國大陸「磁吸效應」) 的問題。資料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zh-tw/台灣奇蹟>

<sup>2</sup> 黑手變頭家指的是製造業中受雇者自行創業而成為自營作業者或是小雇主的過程，發生在

對於資本轉換的理論（經濟、文化、社會與象徵資本）分析不同的家庭背景如何形塑下一代的生命經驗及對其發展的影響。最後，利用藍佩嘉在《做父母、做階級：親職敘事、教養實作與階級不平等》所提及的階級化親職場域作為模板，與前述的理論對話，試圖勾勒出由工人階級的教養態度間接導致階級流動的具體圖像。

## 貳、 生產關係形塑出的社會關係及互動：

在《做工的人》書中呈現了工地現場的實際勞動狀況，這些工人不具有生產工具，必須付出相對的勞力以向資方換取相對的薪資，由此可見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討論到「商品化」的概念。勞動力轉化為一個個商品時，此時雇主為了提高生產利潤，而竭盡所能地壓低生產成本，惡劣的勞動條件便由此而生。尤其外籍勞工甚為嚴重，因為缺少國家保障，又礙於移民法規限制，時常都是在違法的狀態下工作，成為國家必須整頓的對象，有著雙重困境。在這樣的情形下，商品化後的身體也成為這些工人也必須控管的「他者」。為了讓身體能夠負擔更多、長時間、高強度的工作量，以換取報酬，往往透過藥品、酒精麻痺自己早已過勞不堪、疼痛的身體。如同書中在〈呷藥仔〉<sup>3</sup>一節中所寫到：

「說真話，我到現在還是搞不大懂那些止痛藥的差異。師傅們也搞不懂。我們對這些藥品的最大理解程度就是口耳相傳。有些師傅非普拿疼加強錠不吃；有些人，例如粉塵甚大的木工、泥作，則是一定要吃專門的鼻塞喉痛膠囊。久而久之，每個人都有一些私傳的口袋藥品。男工們普遍相信，這些藥品配上高粱後藥力更強，因此，真的有師父將高粱酒裝入水壺中，和止痛藥以併服下。女工們則比較流行服用感冒糖漿，有一種甘草止咳水，據說可醫治百病，從手痛到腳麻，到任何呼吸道疾病，一飲見效，沒有什麼是『喝一

---

<sup>3</sup> 林立青，《做工的人》（台北：寶瓶文化，2017年2月）P. 32

罐』不能解決的。另一些女工則是長期地負重，一但天冷氣寒，便立即喘、過氣。我因為有這種經驗，備有支氣管擴張劑，這也幫過不少工地女工。往往在地下室暈眩，呼吸困難時，帶到工地外吸入「備勞喘」，便會慢慢恢復。」

在這段描述中，工人們因各自不同的工作需求，搭配不同的藥物來「治療」工作所帶來的傷害，延長早已不堪負荷的身體工作的時間。而為了繼續支撐下去，不惜藉由搭配藥物、酒精等「獨門配方」。然而，這些成藥服用以及酒精的組合搭配往往也是非常傷身體的，他們卻又往往拒絕去醫院、診所等正式的醫療機關就診：<sup>4</sup>

「看醫生也是在工地過勞時，翹班離開的一個好藉口。但年長的師傅們受到養家的壓力，以及其他師傅的期待，不能隨便請假就醫。每個人都想要健康的身體。身為領取日新的人，每一天前往就醫的時間，就代表失去一天的薪水。更擔心的，是一去之後所得到的醫生警語。」

身為工人，並未有多餘的時間或者給薪的休假日，去醫院或者診所就診。為了服膺於工地的勞動需求，必須按照工作的時數，換取相對的報酬，在生活的經濟壓力下，這些工人們不願意將能工作的時間，「浪費」在看病上。此外，又害怕去看病之後，若是被檢查出了問題，需要花費大把的醫療費用治療，將造成更大的負擔和焦慮。且大多時候，在必須工作賺錢養家的情形下，對於醫生的醫囑往往是無法配合的，如此一來也失去了去看病的功能。除了服用大量的藥物來抗衡身體的病痛之外，工人們為了在惡劣的天氣條件下工作，也會以酒精來「控管」、「調適」自己的身體，達到保暖、提神的作用，在〈工地調酒〉一節中所述<sup>5</sup>：

---

<sup>4</sup> 林立青，《做工的人》（台北：寶瓶文化，2017年2月）P. 33-34

<sup>5</sup> 林立青，《做工的人》（台北：寶瓶文化，2017年2月）P. 42

「在我看來，工地的喝酒高潮在冬天，尤其是下雨的冬天。有些建案所在之處冷風刺骨，若加上天雨，整個人整天下來都不得歇息。這種時候，戶外的的工作更顯恐怖，所有人到工地現場都很清楚，如此惡劣的環境仍來工作，不過是為了糊口而已。因此從入場前就有人已經帶著混濁的氣息，和逐漸散出微熱的體溫，前來應付一天的工作及進度。工地的現場周遭，在冬天也『應景』地會出現一些奇特的酒類，例如一罐一百元的紅酒、兩百元即有的二鍋頭或是高粱。最近有些年輕人會到 7-11 買上小罐的伏特加及調酒，一來耍帥，二來禦寒。」

書中介紹在工地中的工人藉由不同的酒類搭配，來因應不同的身體、天氣狀況。綜合上述書中兩節〈呷藥仔〉和〈工地調酒〉所陳述，不外乎就是工人們必須讓自己的身體能夠負擔起工作需求所發展出的因應策略（*coping strategy*）。藉由酒精、藥品的使用，以調控、壓抑身體的自然反應，使得身體成為了工地現場的「他者」，需要備受控管、監督，以服膺於資本家的工作需求，才能足以換取薪資，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存活下去。在書中在後半部談論到這些工人往往在接近老年時，大多身體已開始出現病痛和殘疾，而無力工作，導致中斷的經濟收入，必須花費大把的醫藥費治療，造成生活上的困頓和匱乏，衍伸社會問題，又加深社會對於工人階級的偏見和汙名。

此時勞工階級的標籤背後代表的涵義與背景，便是商品化的身體，像是失去了人性，他們只是生產過程中的消耗品。資方或是社會並不把他們當成一個個有生命、尊嚴的人，進而影響了社會地位及社會中的其他成員對待他們的方式。在〈賊頭大人〉一節中<sup>6</sup>，描述了許多工人與警察關係中的緊張、衝突關係。如同上面所陳述，因為工人們必須透過藥物、酒精讓自己的身體

---

<sup>6</sup> 林立青，《做工的人》（台北：寶瓶文化，2017年2月）P. 91-103



能夠持續工作，並承受因工作帶來的疼痛與不適感。在工作往返的途中，他們便成為了警察首要臨檢、盤查的對象。在〈賊頭大人〉一節中<sup>7</sup>：

「……. 而是『逢工就攔』的酒駕檢查。幾乎所有的工人都有這種經驗：只要穿著雨鞋、騎著機車，並且臉色或黑或紅，衣服看起來是做工的，警察就會特別跑來問有沒有喝酒。上午問，下午問，也還真的有一個、兩個被抓到。我也遇過被抓了大方告訴我後便入監去的，畢竟沒有錢也贖不回自由，算了一下現在天氣不是太熱，乾脆就進去蹲著幾天省錢算數。在要入拘留所的前一天，師傅們依然痛罵著警察，幹譙國家制度欺負弱勢的做工仔人。」

警察作為國家機器內監控社會的角色，與這群社會底層的工作者之間的關係，凸顯出勞工階級在社會中生活的深層矛盾。身為邊緣群體的工地工作者，在經濟、社會地位上往往被視為「高度關懷」或是「問題人口」，因而也成為警察時常會盯上的對象。而警察對於這些工人階級的態度也可在書中可見一斑：

「同天工地遭竊，水電師傅的白扁線被偷了，工地一整天罵聲不絕，原因是警察面對那被派去報案的年輕學徒，既沒有拿出報案三聯單，也沒有到場，就這樣草草了事。我直接打了電話給一一零，說明地址並留下我的手機號碼後，坐等警察到來。沒多久兩個警察到場，我將失竊的物品名稱、數量寫完整後交給警察，帶他們前往拍照，並且告訴他們可能的入口，接者騎那台被開單的機車前往警局作筆錄。我回來時，聽那年輕的學徒說，警察面對我的態度和他完全不同。對待我時，有問必答，對待他時，則顯得非常不耐。」

在這裡警察對於作者和年輕工人有著不一樣的態度，原因在於作者屬於

---

<sup>7</sup> 林立青，《做工的人》（台北：寶瓶文化，2017年2月）P. 96

工地中的管理階級的角色，且相對於年輕工人有著較高的教育水準，在應對和談話間並未展現屬於工人階級的既有印象，使得警察較為尊重作者，但對於工人階級，往往是採取不屑、輕視的。在這裡我想要指出，這並不能代表所有警察的態度，書中所指出的只是工人階級拒斥警察、與警察衝突的樣貌，並不代表所有的警察都會採取如此的態度和作法。除了警察之外，書中也描述了好幾件工人們因機車未作排氣檢查，而遭到環保局開單的衝突經驗。這些國家機器和工人們之間的互動樣貌，反映出工人階級對於整個國家體制的不信任與拒斥，及應對策略-退縮至社會的角落，如同書中所述「瀕死不做賊，冤死不告官」的邊緣經驗。

以上談論完工人階級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後，書中提到這些工人往往都早早結婚生子，又或者過了一定年齡後娶了外籍配偶，生下下一代。因此，筆者好奇這些勞工階級的子女在學校與同學互動的經驗，是這裡要討論的重點，他們與同學、老師互動的策略為何？這裡我們可以從 Robert Grandfield 所著一文中《Making it by faking it-Working-Class Students in an Elite Environment》<sup>8</sup>反觀台灣複雜的階級經驗。而在台灣，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的公立學校並不像美國的社區與學校存在明顯的階級區隔（藍佩嘉，2013）。因此，學校內便有著不同階級身分的子女「混雜」的情形，此時學生文化、經濟資本的背景差異便在學校學習的過程中被顯現出來，可能造成底層階級學生的自卑感和疏離。這樣的矛盾讓這些學生可能會發展出對應的策略，於此應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Goffman,1973）所提出的戲劇理論<sup>9</sup>解釋學生在學校的互動過程與情形。高夫曼(1922-1982)認為每一個人都很在乎別人對其言行

---

<sup>8</sup> Robert Grandfield 所著一文中《Making it by faking it-Working-Class Students in an Elite Environment》裡頭提到勞工階級的子女進入法學院精英階級後的身分認同矛盾，藉由「隱身」、管理自己的身分認同，嘗試融著英階級，卻又格格不入的矛盾感和階級認同衝突的罪惡感，之後便發展不同的策略化解危機。

<sup>9</sup> 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從戲劇表演的觀點，看社會互動。他把生活看成一個舞台，每一個人與他人在舞台上扮演互動的角色，而每一個人又是觀眾；每一個人在演出時，希望得到他人的鼓勵和讚賞。因此，社會生活是由影響他人對於我們的印象所組成的，而影響別人印象的方式，則是讓人知道，我們是「有所為」與「有所不為」的。(Goffman,1973)

的評論，藉此，在上述 Robert Grandfield 文章中，當這些勞工階級的子女進入菁英階級的校園場域時，會學習菁英階級的品味（言行、穿著等）以便融入。在工作面試時，也盡量隱藏或者編造其階級背景，以進行印象處理，只公開對其有利的部分，隱藏不利的部分。在台灣的脈絡下，校園場域中混雜的各種階級背景的學生，不盡然如同 Robert Grandfield 文章內勞工與菁英階級人數比例懸殊，造成需要「融入」的現象。但若仔細觀察，我們仍可以在學校場域中的互動發現，許多經濟資源較差（同時也大多都來自勞工階級）的學生與其他同學比起來，似乎缺乏太多物質、娛樂上的滿足和享受，而影響與同學間的互動關係，也可能進一步造成人際關係的疏遠。最明顯的便是在「便服日」時，許多經濟資源較好的學生會穿著時髦、名牌昂貴的衣服來到學校，並與同學分享，也引發羨慕；相較之下，這些經濟資源較差的學生，穿著「雜牌」或是較老舊的衣服時，便會感受到強烈的自卑感及不舒服，甚至會被嘲笑、數落等等。他們因而轉換策略，往往都在便服日時還是穿著校服，隱藏其物質享受上的缺乏，也同時意味著家庭階級背景的差異。而在面試時的印象管理（隱藏、編造其階級背景），背後預設著面試者較偏好相同階級學生。這樣的情形類域於學校場域中，如同 Bourdieu 的觀點指出，在學校的師生互動是依循著老師的「慣習」所指引，尤其在學校教育中，經常都是傳遞中產階級的文化，老師也大都來自中產階級的家庭，與學生互動的過程中也因此對來自中產階級的學生較為契合，在學習上給予較多的鼓勵、支持、肯定，造成學生在學習差異。再加上中產階級的學生先備了中產階級的知識內容，他們的文化資本與學校所教育的知識類型是相近的，因此在學校又能有較好的表現，來自底層階級的學生無法熟悉這套知識體系，在學業成就上表現不如他們，進一步造成階級再製，維繫階級不平等的現象。

### 參、 從工人的教養態度看見階級流動可能性：

這些勞工階級的工人們對於子女教育的投資和態度，書中在〈子子孫孫〉



一節中談到：<sup>10</sup>

「有錢人往往給子女較好的環境，但在工地現場看過去，我也不覺得勞工的孩子有比較差。反倒是工地的師傅們會讓兒女更早自由發展，常常不設限，也較不認定非那些工作不可，有高職讀高職，有大學讀大學。科技大學和大學差在哪裡？這些師傅往往也聽不懂，總之讀的比自己高，也就值得開心一番。我所見到的師傅們，若是經濟許可，多會為孩子繳學費。這是一種『能讀多少就讀多少』的觀念轉變為『能讀多高就去讀多高』，並且或多或少對孩子寄予巨大期待。」

以藍佩嘉在《做父母、做階級：親職敘事、教養實作與階級不平等》所提及的階級化親職場域<sup>11</sup>解釋，我們可以發現這是一種勞工階級在第三、四象限中資本低（Y 軸）與益品追求自然發展和益品追求競爭流動（X 軸）游移的情形（書中未提及更明確的教養態度，因此採取兩種情形討論）。在同樣家庭資本總和少的狀況下，對於益品追求程度的差異，例如對於成績的要求、作業的督促等等，將會影響下一代的發展。這樣的教養態度與教育資源的投入，以不會參與課外補習或者其他精進其學習資源和成效等等的對象，屬第三象限。這裡有必要指出，父母親對於益品追求自然發展的教養態度，很常反映出工人階級中經濟能力又較差的家庭背景，而並非單純是家庭的意願為選擇的原因。這些家庭甚至連基本教育的學費都必須透過借貸的方式才能供應子女上學，因此，無法全然歸類於家庭對於子女的教養態度「自由」選擇上，很多時候是受情勢所逼，不得不如此選擇。陳接上文〈子子孫孫〉一節

<sup>10</sup> 林立青，《做工的人》（台北：寶瓶文化，2017年2月）P. 70

<sup>11</sup> 藍佩嘉將階級化的親職場域分為四個象限，其中 x 軸為對於益品追求的程度，越往正向代表競爭，反之則代表自然；y 軸代表著父母資本的總和。藉此區分出不同的教養態度，分為第一象限：培養競爭國際力、第二象限：規劃自然成長、第三象限：順其自然造化、第四象限：培育階級流動力。藍佩嘉，《做父母、做階級：親職敘事、教養實作與階級不平等》，台灣社會學第 27 期（2014 年 6 月），頁 39

所述：

「當然，也有經濟能力較差的師傅，若是可以則會借貸來應付，比如讓孩子辦助學貸款，其他得靠另外借貸來支應。這有點特別，工人之間若是為了投資借錢，那不一定；但若是真的為了孩子借錢倒很容易，也很難拒絕。」

如此的狀況，在 Bourdieu 的觀點看來，已經缺少的文化資本會影響其學習成效，如上一節中所提及，但又無法以經濟資本補齊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上的不足，進而影響子女在社會的發展。而第四象限者，父母大多會盡可能的省吃儉用，供其孩子補習、參與課外學習活動，相對來看則較有機會成功翻轉階級。綜合上述，使用地位取得理論 (Blau & Ducan, 1967)<sup>12</sup> 分析。這些光譜右側的勞工階級的教養態度，與中產階級比起來雖少了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但在教育投資上，也盡力以其能提供的經濟資本補齊，因此家庭背景無法直接地影響個人的社會發展；而第三象限的家庭反倒就有著高比例的階級再製情形。若是成功的在升學體制中獲得成就，進入到公立高中、職，或者公立大專院校等等，學費相對於私立學校負擔也少了許多，家庭較能夠供其繼續研讀。且教育資源，無論師資、設備等等也較為豐富，能夠有效增加其學習成效。在學費負擔較少、公立學校資源豐富和台灣文憑主義的公立名校光環下，能夠大幅增進了其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力，進而導致翻轉階級的可能性。近年來台灣高等教育的擴張，如做工的人書中所述：「這是一種『能讀多少就讀多少』的觀念轉變為『能讀多高就去讀多高』，並且或多或少對孩子寄予巨大期待。」然而，也是因高教政策的擴張，導致進入大學的門檻降低，加上普遍少子化的現象，使得台灣的大學供過於求，許多大專院校、科

---

<sup>12</sup> 身分地位取得理論內涵在於學校教育對個人後天地位的取得有著重大的影響，而其中，教育資源也牽涉到個人家庭背景對教育資源的投資差異，因此，看似「公平」的教育讓每個人皆有平等的機會取得社會上較好的地位，實質家庭背景還是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但非背景因素的條件，例如教育擴張，可能會縮減此差異。(Blau & Ducan, 1967)

系所因招不到新生陸續停開、停辦。大學畢業的文憑在就業市場中相較於以往的情形有貶值的現象，若是要在就業市場中脫穎而出，則多數需要繼續研讀研究所、博士、精進自己的其他專業技能或考取證照等等。在這樣的情況下，教育程度的高低已無法完全保障就業的穩定和選擇，但仍是個人在階級結構中，流動的最大可能性之一，且在台灣的社會中往往是的基本入場券。

#### 肆、 結語：

本文試圖從《做工的人》一書中延伸探討階級關係和社會關係的互動和變化。以馬克思《資本論》先釐清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的連結，商品化的他者在社會中被視為一個個機械化、無尊嚴的身體，並體現在書中〈呷藥仔〉和〈工地調酒〉兩節中。從階級地位的低落衍伸至人格的貶低，藉由《賊頭大人》的故事立體化地呈現出與社會關係的關聯性和互動模式，另外也探討這樣階級背景的下一代是如何在學校中與他人互動。藉由 Robert Grandfield 所著一文中《Making it by faking it-Working-Class Students in an Elite Environment》反觀台灣複雜的階級經驗，並利用高夫曼的戲劇論分析學校場域內的互動展演模式，並提出我自身在校園中的觀察經驗。學校作為階級流動的重要培力場域，在引用 Bourdieu 的觀點指出，在學校的師生互動是依循著老師的「慣習」所指引，尤其在學校教育中，經常都是傳遞中產階級的文化，老師也大都來自中產階級的家庭，與學生互動的過程中也因此對來自中產階級的學生較為契合，在學習上給予較多的鼓勵、支持、肯定，造成學生在學習差異，進而導致階級再製，維繫階級不平等的現象。

接著討論階級關係造就的不平等有無可能被改變？以藍佩嘉在《做父母、做階級：親職敘事、教養實作與階級不平等》所提及的階級化親職場域解釋，並利用 Bourdieu 的觀點作為補充。最後利用地位取得理論（Blau & Duncan, 1967）解釋上述家庭對於教育投資的態度對於個人階級流動的影響，而在台灣高等教育的擴張的脈絡下相當程度有促進個人較有進入高等教育，進而產

生階級流動的可能。不過在此，筆者仍是特別以台灣社會的脈絡強調教育程度的高低已無法完全保障就業的穩定和選擇，但仍是階級流動基本的人場券。

#### 伍、 參考文獻：

1. 林立青，《做工的人》（台北:寶瓶文化，2017年2月）
2. 馬克思·恩格斯著，吳家駟譯(1990)。《資本論》。台北市:時報文化。p.47~101
3. 藍佩嘉，《做父母、做階級: 親職敘事、教養實作與階級不平等》，台灣社會學第 27 期（2014 年 6 月），頁 97-140。
4. Robert Grandfield, 《Making it by faking it-Working-Class Students in an Elite Environment》 p.145~157
5. Erving Goffman,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1961）
6. Pierre Bourdieu, 《區隔：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法文版書名為 *La Distinction*,1984）